

東德的社會主義體制危機

吳東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今年(一九九〇)元月廿九日東德總理莫德洛(Hans Modrow)向國會「人民議院」(Volkskammer)與兩德的電視觀眾宣稱，將提前於三月十八日舉行的全國自由選舉，是解決東德瀕臨崩潰的經濟、消除社會動盪不安與防止難民潮擴大等問題的唯一途徑。稍早東德朝野十四個政黨間曾召開「圓桌會議」，決議立刻展開新憲法起草工作，而且計畫於大選後交由全民複決。近日社會主義統一黨(SED；以下簡稱社統黨)也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PDS)。這一連串的政治變革，正是為回應日趨嚴重的體制危機所作之變通。

壹、引言——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架構下的問題

東歐局勢發生空前的變化後，政治與經濟學者所關切的議題，不外乎：1. 為什麼在東歐五國邁向政治民主化的初期，層出不窮的經濟問題立刻浮現檯面，特別是東德的經濟已幾近崩潰的邊緣？2. 以往東歐國家歷次施行過的改革政策，其失敗的主因何在？3. 未來東歐的改革路程中，如何在國家權力與市場力量間尋求一個既能提昇經濟發展效率又能兼顧所得分配的利益平衡點？基本上，這三項問題涉及政治與經濟結構的互動關係；①換言之，東歐國家呈現的經濟困境，除了四十年來計畫經濟制度之使然外，政治結構不健全也是另一大病根。

一般而言，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作比較分析時，通常會觀察四個次級體系(subsystems)——決策者、計畫與管制、工作誘因、體制目標的運作。這些次級體系在相當程度上能提供解決國民經濟發展中一些關鍵性問題的思考方向，②同時

註①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s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7, pp. 161-236.

註② Jiri Kosta, "Sozialistische Wirtschaftssysteme", in Klaus Ziemer (Ed.), *Sozialistische Systeme-Politik,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München, 1986, pp. 443-455, here p. 444; 另參閱 B. Horv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Armonk/New York, 1983.

也對本文在分析層次方面有所幫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的這四個次級體系之間，嚴格說來並無強制性的關連，但是相互間却具有依存性；例如傾向中央集權與計畫經濟的某一個階級（*hierarchist*）或威權決策機構，相當程度上亦會偏好高（利潤與資本）積累率的快速經濟成長，也喜歡制定一種能自給自足的貿易政策。在中央集權的計畫與管制方式下，當權者為達成經濟計畫的目標，通常會控制勞動者的工資與獎金，同時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策略，更加速了管制體系中的集權現象，而完全忽視民間強烈的消費傾向，從來不作權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的思考。過去，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社會主義體制下，經濟與政治結構不均衡的發展，使黨官僚的專權範疇擴大至社會的各個層面，形成經濟發展決策過程中的障礙。於今，幾乎所有模仿自蘇聯農業集體化政策的東歐國家，都嚐到政經分離所帶來的苦果。

採行中央集權與教條式體制之國家，^⑤有關決定產品項目的生產、生產要素的配置、以及產品與服務的分配等決定權，並非單獨亦非完全受到所有權關係的主導，問題需要探討的根源在於生產、分配與消費受到那些決策者的支配。社會主義國家中公衆事物（如道路、醫院或學校等）的生產，雖類似資本主義社會的作法經由政治體制所決定，但基於社會內部中央與地方政治官僚機構的權限範圍過度膨脹，使原有經濟決策層面（計畫官僚與企業管理）功能不彰，反倒是政治團體與某單一體的特權行為模式，成為主宰經濟政策的重要變數。^④

計畫經濟範疇內管制的成效，通常取決於工作動機的強弱，不同的改革型態應有不同的刺激方式。除了以政治道德的訓示去提昇勞動誘因之外，所得分配之平均也應占有重要之地位。然而在現實環境之下，東歐社會的所得分配却往「均貧」的方向發展。此外，國民經濟計畫目標的制定，一般要配合決策者的經濟發展策略，其中所牽涉之層面甚廣，包括了經濟成長的速度、發展項目的結構（如工農比例、重工業與輕工業比例、生產與經濟基礎建設間的關係、分配與消費的調和），以及區域發展與外貿策略等，如果政策的形成係由中央控制一切，即難以正確反映出市場的供需，同時過於偏向重（國防）工業的發展，人民生活當然無法獲得改善。

由四十餘年的歷史演變中可以看出，共黨政權除了在經濟蕭條時期，通常不重視經濟學家的觀點與建議，排斥革新派的

註③ 係指南斯拉夫（或許匈牙利）與納粹德國之外的所有共黨國家。Charles E. Lindholm, *op. cit.*, p. 161.

註④ L. Bress/K. P. Hensel (Eds), *Wirtschaftssysteme des Sozialismus im Experiment-Plan oder Markt?*, Frankfurt/M., 1972; A. F. Rumjanzew (Ed.),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 (Übersetzung)*, Frankfurt/M., 1973; Klaus von Beyme, *Ökonomie und Politik im Sozialismus*, München, 1977; J. Kosta, *Wirtschaftssysteme des realen Sozialismus-Probleme und Alternativen*, Köln, 1984.

意見，祇因為懼怕權力下放會動搖其政權的獨占與政治體制的安定。一九六〇年代的捷克與匈牙利、^⑤一九七〇年代的波蘭，以及變動前的東德，^⑥都印證了欲使改革成功，必須以健全的政治架構帶動經濟體制的革新。

貳、東德經濟危機的潛伏因子

全球的共黨政權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幾乎都面臨相同的困境，即多樣性危機（multiple crises）——經濟、社會、政治、種族、意識形態、以及社會道德問題^⑦的形成，歸根究柢在於從計畫、執行到控制完全聽命於中央的經濟型態。計畫原則原本係社會主義經濟管制過程中的一項特徵，它不僅確立國民經濟的計畫目標，同時亦主導不同層面的執行工作。當前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體制革新，對計畫原則的概念詮釋，已不盡然與理念中的社會主義相同；其中除了規範義務與經濟政策工具仍被視為計畫經濟成敗的關鍵外，生產過程中原料的分配使用（產品的數量、規格或重量）、工廠之規模與勞動之時數，乃至相關的金融業務（如產品的價格、成本或利潤），皆附屬於計畫之範疇。這種政治權力的集中，當面臨社會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危機時，即很難去迅速整合或動員社會的羣體力量，尋求問題解決的共識，反而易於引起危機連鎖反應。東德人民的人民生活準一向位居東歐國家之首，國民所得亦排名第一（1986:11,117US\$），尤其就業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1987:53.7%）與女性人口的就業率（1988:90%），即使是西方的先進國家亦望塵莫及。理論上，東德缺乏類似波蘭與匈牙利兩國主導經濟改革層面的動力，但為什麼會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即把整個國家帶入破產的邊緣？追根究柢其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一樣，有一個強勢的國家權力與弱勢的市場力量。當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即共黨，以下簡稱社統黨）當權者經年極端的保守與教條作風，以及政策制定過程中受後史達林主義（Post-Stalinism）思維的局限，使「遲滯性的緩慢成長」（stagflation）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即已顯現出來，^⑧種下今日爆發經濟體制危機的潛伏因子。

其實，社統黨以往亦曾推動過行政革新計畫，其所擬定的技術官僚政策與整飭黨政體系弊病的措施，並未帶動社會各個

註⑥ 參閱 K. C. Thalheim/H.-H. Höhmann (Eds), *Wirtschaftsreformen in Osteuropa*, Köln, 1968; R. Selucky, *Reformmodell CSSR-*

Entwurf einer sozialistischen Marktwirtschaft oder Gefahr für die Volkedemokratie? Hamburg, 1969; J. Krejci, *Social Change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 London, 1972;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Harmondsworth, 1978.

註⑦ 參閱 J. Behkenhagen, *DDR und Osteuropa-Wirtschaftssystem, Wirtschaftspolitik, Lebensstandard*, (Handbuch), Opladen, 1981.

註⑧ Rolph Miliband,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New Left Review*, No. 177, pp. 27-36.

註⑨ Klaus Steinitz, "Innovationsprobleme und Strukturwandel in der DDR,"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No. 10/1989, pp. 29-40.

層面的現代化，反而助長了經濟情勢的惡化與生態環境的摧殘，尤其是政治特權與貪污更腐蝕了整個政治與經濟組織的結構。由縱面的剖析來檢視當時的社統黨，其不願意面對現實的潮流，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結果其所建構「一切為民」(all for the people)的社會主義美景，事實上祇成就了領導階層中的個體，而蔑視社會羣體生活的存在。以往共產黨剖析資本主義時，常將之比喻為「人吃人」的社會，却故意不提共產政權下特權剝削人民的現象。東德朝野為此所宣洩出的怨氣，早期固然能促進整個社會建立新思維的理念，亦能對共黨制定革新政策發揮推波助瀾的功效，但是在國家體制根本架構不容改變的原則下，一切的改革措施多陷入曇花一現。此一惡性循環效應，導致政權與人民間日益疏離的兩極化對立，終難避免後史達林社會主義模式下的普遍性危機。西德學者創立「現實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一詞，^⑥即顯示其對社統黨缺乏具體計畫與觀念的改革不表樂觀。事實上，社統黨沒有從一九六八年春捷克的改革實例與一九八〇年代初波蘭的工運中得到啓示而掌握先機，即已注定史達林式共黨集權體制失敗的命運。目前東德內部的問題叢生，正足以說明不論舊有的社會規範、既存的機構體系或是社統黨傳統不成文的領導行為模式，都無法解除現存的危機，唯有重新調整國家的政經架構，在體制上作根本的變革，才是唯一的途徑。

叁、不協調的政經結構關係

就共黨國家而言，政治經濟學中所探討的社會個體(individuals)追求自我利益的程度，與當權者主導經濟行為應有的範疇，似乎都無一定的規範。東歐共黨政權普遍存有的政策理念宣傳與迷信史達林主義下的實際作為，兩者之間所產生的矛盾現象，基本上與西方民主運作的思維過程大不相同，其目標不外乎想建立整體社會的一致性；^⑦因此民衆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必須受到體制運作的駕馭。這幾年來，東德共黨在這一方面雖有放鬆管制的跡象(例如坐視兩德邊境區非正式

註⑥ 「現實社會主義」一詞係西德學者為諷刺東歐共黨社會主義體制實際的運作，與傳統的社會主義理想有別，所作的一種否定性自我詮釋，尚不能稱為一家學說。(Negative Self-definition); Jiri Kosta, "Sozialistische Wirtschaftssysteme," in Klaus Ziemer (ed), *Pipers Wörterbuch zur Politik*, Bd. 4, München: R. Piper & Co. KG., 1986, pp. 443-455, here p. 444; "Die Quelle des Stalinismus,"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 10/October 1989, pp. 1250-1255.

註⑦ Gerd-Joachim Glaebner, *Die DDR in der Ära Honecker-Politik,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8; Gert-Joachim Glaebner, *Die andere deutsche Republik-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DDR*,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0.

團體之活動)，但是根本的原則却絲毫未曾考慮變動。即使在民意壓力下解散了人民深惡痛絕的國家安全部，但是共黨秘密警察監視異議人士的行動却仍未終止，^⑭總理莫德洛主張另設「憲法保護局」(Office for National Security)所引起在野勢力的激烈反彈，^⑮即可印證共黨政權堅持經濟改革與政治結構重整必須分別對待的理念，很難因應環境之變遷作適當而又徹底之調整。

政治結構是否健全，係影響經濟政策決定形成與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從東德的國家體制結構來論其整個官僚體系決策形成、領導人的企圖心與政策的抉擇模式，並無一定的規範可循。以往西方學者在這方面的純學術論著亦不多見，尤其對研究者感到最難探尋的問題是：社統黨實質上究竟賦予總書記職位那些具體的權力？蘇共中央在社統黨的決策過程中，又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由社統黨過去的政治實際運作中或可論斷，東德經濟決策的過程，係經由中委會之下的相關部會(例如「國家計畫委員會」)與附屬學術研究機構^⑯間共同合作擬定出政策方案，交予每週召開一次會議的政治局作成決議，其他的社會或國家機構通常祇扮演備詢的角色。^⑰理論上，東德制定某一項經濟計畫前，應該歷經計畫機構與聯合企業之間資訊的交換，以及不斷進行的修正過程，同時中央在預期經濟成長與結構目標時，亦應與市場需求的調查結果相配合，甚至要考量到各下屬經濟單位生產的可行性和國家經濟基礎建設的情況，領導機構之間橫向聯繫與不同領域的經濟單位或機關之間縱向的溝通，才是決策形成前必要的措施。自一九七四年社統黨公佈企業計畫經濟路線以來，^⑱國民經濟五年計畫制定的流程(見圖)，即形成統一的模式。換言之，一切的決策權都落入社統黨領導機構之手。

註⑭ Joachim Nawrocki, "Geht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 zu Ende?", in *Die Zeit*, No. 3/1990, p. 3; Marlies Menge, "Einig gegen die Einheitspartei", in *Die Zeit*, No. 4/1990, p. 9; Joachim Nawrocki, "Unruhe wird zu Zorn", in *Die Zeit*, No. 4/1990, p. 7; *Der Spiegel*, No. 51/1989, pp. 35-44; No. 2/1990, pp. 61-63; No. 3/1990, p. 4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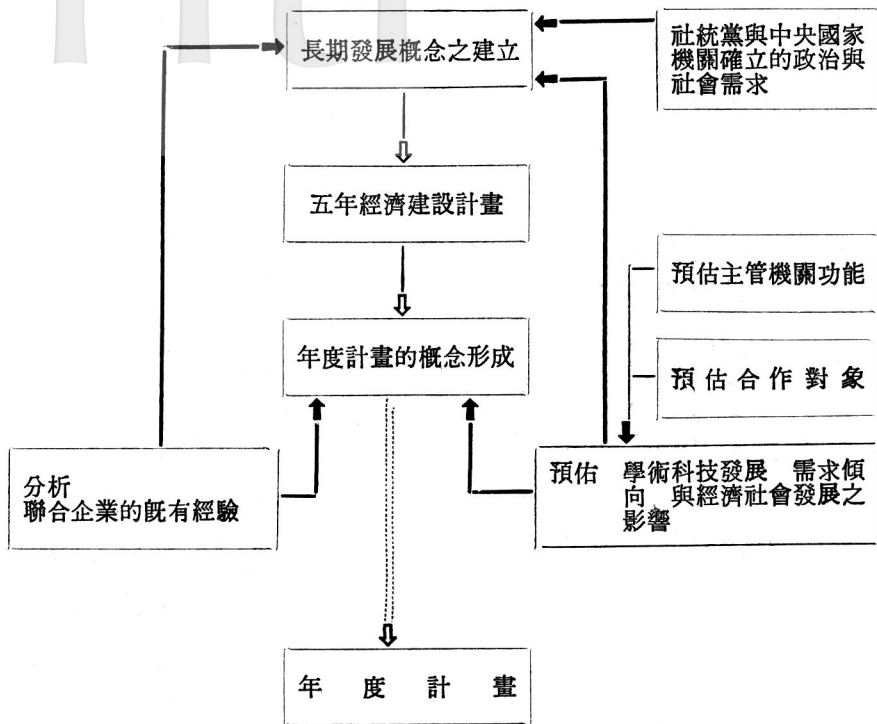
註⑮ *Der Spiegel*, No. 2/1990, pp. 61-63.

註⑯ 為保障領導學術工作，社統黨多年來會創設許多黨內研究機構，其中以附屬社統黨中委會之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所」(AFG/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與「社會主義經濟管理中央研究所」(ZSW/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t Economic Management)最具代表性。

註⑰ Gero Neugebauer, *Partei und Staatsapparat in der DDR-Aspekte der Instrumentalisierung des Staatsapparates durch die SED*,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8; Peter C. Ludz, *Parteielite im Wandel: Funktionsaufbau, Sozialstruktur und Ideologie der SED-Führung-Eine empirisch-systematische Untersuchung*, Köln/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0.

註⑱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會作過若干修定，見 *Gesetzblatt*, 1974 (Sonderdruck), p. 775 a, b, c; 1975 (Sonderdruck), p. 780, 1980 (Sonderdruck), p. 1020 a-q, 1980 (Sonderdruck), p. 1021.

東德社會主義經濟計畫制定流程圖



資料來源：Handbuch der Planung für Kombinate und Betriebe. Industrie, Ed. by einem Autorenkoll und Ltg. von H. Thiele, Berlin (East), 1982, p. 116.

- 此外，學術上較難探討的另一項問題，涉及社統黨如何將其各項政治意志付諸實現？如果我們從西方學者對東德國體制研究的論著中去探索這些問題，大致可以從觀察社統黨將其政治意志移轉至社會大眾的過程，歸納出七種不同的傳達型態：^①
1. 將領導階層的決議、法令與規章，透過立法的程序傳達至社會團體、民衆組織與附庸政黨；
 2. 根據社統黨黨章第卅九條之規定，政治局委員等中央黨官僚可兼最高行政機關首長與經濟部門主管一職，親自執行層峯擬定之政策；
 3. 社統黨以其制定的幹部政策，派員滲透至社會各階層負責主管業務；
 4. 經由社統黨組織化的運作，加強經濟機構與社會團體間橫向的聯繫；
 5. 透過所有的社會機構動員基層民衆的參與感之宣導與傳達工作；
 6. 以隸屬於社統黨的媒體宣傳機構，進行政令見團體的分歧，必要時對異議分子採行驅逐出境或拘禁的措施。
- 上述列舉的七項層層管制措施，基本上即在配

合社統黨決策中心意願的實現。在這種中央集權政治架構下的經濟發展模式，久而久之在意見傳達方面，自然形成中央決策機構與生產單位間的斷層現象。

一般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論定某國的經濟發展內涵，應包括對人力與資源運用、價格的決定、所得的分配與經濟成長的增進和維持等四個層面進行分析。^⑦由此一研究範疇，我們大致可以演繹出社會大眾想追求的是那些經濟目標（如物價穩定）。共黨政權採行的中央集權式管制經濟下，政府幾乎掌握了所有的生產工具，其控制的範圍涵蓋社會各個層面，從民生的大需求至一般人民的生產、交換、就業或消費等經濟行為，皆聽命於政府的安排，個人毫無自主性可言。東德政經結構的不均衡發展，不僅使國家的權力無限度擴張，而市場的主導力則日益萎縮，同時社統黨領導人又制定一連串的錯誤投資與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策略，造成今日經濟危機的普遍現象：

——東德每年的國民生產經濟指標，僅靠約二百卅家企業在苦撐。一方面產品的製造成本過高，特別是機械工業的成本往往超出西德的六倍之多；另一方面，政府在爲了賺取西方外匯的心態下，價格無法隨市場機能作適度調整，導致出口利潤降低。一件值一馬克的产品轉至西方市場，就祇能賣到一角五分錢，完全失去競爭能力；昔日著名於西方世界的魯拉（Ruhla）鐘錶，今天已被遠東國家的產品所取代。若非西德政策性的支援，東德的經濟早已陷入絕境。同時，東德外貿總值與經濟成長持續數年無法達到預期之成長目標，^⑧尤其在產品需求增加與供給減少時，價格却不准提高，自然面臨民生用品短缺的困境。此外，凍結價格的措施表象上帶來了物價之穩定，實際上却形成黑市交易的猖獗，以及助長了官僚體制貪污與受賄的惡性循環效應。物資缺乏所造成的另一項後遺症，是東歐國家普見的貨幣危機，東德馬克於柏林圍牆開放後短短的一個月內即貶值四倍，一般人想買一束鮮花，也被迫使用西方的貨幣。^⑨

——東德官方在統計經濟成長指數時，通常不將通貨膨脹的因素列入考量，因此常見虛報浮誇的數據。就以一九八七年的民生工業生產而言，如果依照官方強調的六·九%實質成長率實地觀察，近兩年來東德人民生活用品缺乏的現象，始終未見

註⑦ 高希均，*經濟學的世界*，臺北，天下叢書，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第十版，第七頁。

註⑧ 東德的出口一向以東歐國家爲主，一九八八年的外貿總值一七七〇億馬克，僅較一九八七年的一七六六億馬克成長〇·三三%；經濟成長率則由一九八七年的三·六%（1986:4.3%·1985:4.8%）降至一九八八年的二·七%，較預期目標的四·一%爲低。Die Zeit, No. 6/1990, p. 32; Der Fischer Welt-Almanach, 1990, p. 234; 1989, p. 228ff.; 另根據東德哈勒（Halle）大學教授塔爾（Peter Thal）的評估，東德每流失一萬名勞動人口，將損失三千萬馬克的國民總收入，若再將逃亡者的未來工作能力列入計算，東德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的長期總支出，會是一個天文數字。Joachim Nawrocki, "Alles außer Plan", in Die Zeit, No. 45/1989, p. 25.

註⑨ Der Spiegel, No. 45/1989, p. 27f.

紓緩。^②

—政府貼補消費品政策是計畫經濟體制的特色之一。東德政府每年耗資約三百億馬克，以維繫多年來的低糧價政策，同時亦補貼數十億馬克用來維持一貫的低房租政策。^③事實上，這種政策非但沒有滿足人民提昇生活水準的需求，^④反而造成民衆隨意浪費的習慣，以麵包餵食牲畜的作法隨處可見。

—使用數十年的陳舊機械設備，因受限於計畫經濟的分配原則而久久無法汰舊換新。根據東柏林經濟研究所(Deutscher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專家史瓦濤(Cord Schwartz)的評估，一九九〇年代初東德的生產設備，起碼有四分之一在製造污染，必須即刻予以報廢；^⑤換言之，汰換生產機器將迫使一百萬名勞動人口轉業。這些現象不僅使生產成本高居不下，因而浪費的能源更不計其數。僅僅就東德化學工業生產的褐煤而言，每年都高達三千五百萬噸之多。^⑥

—就理論上說，計畫經濟中的分配原則，論及「非個人消費」時，長期上應有助於促進較高的經濟成長，^⑦然而實際上若無生產的誘因、經濟發展的優先順序，以及生產效率等因素的配合，即很難達成預定的成長目標，尤其是共黨社會中平頭式的平等，不論人的工作性質與成果，高(如教授每月二千馬克)低(如工人每月一千三百馬克)收入的差距不多，^⑧在調動勞動意願方面鮮有成效。此外，東德這方面的問題也源於整個政治官僚體制結構的不健全，當權者每年都會花費約四百三十七億馬克從西方進口奢侈品，^⑨供上層的官僚和幹部揮霍。當物質生活缺乏的民衆經年面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時，實在很難積極提昇其勞動的意願，造成今日東德工人的生產力，充其量祇達到西方工人水平的一半。^⑩政治學者探討官僚體制貪污能促進效率的理論，^⑪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解釋東德的發展實況；然而就成本利潤(Cost-Benefit)而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

註① *Der Fischer Welt-Almanach*, 1990, p. 234.

註② 例如數十年來，東德一個麵包值一毛五分的價格從未變動，政府提供的四房公寓，每月租金亦僅四一·八馬克。*Der Spiegel*, No. 40/1989, p. 30; No. 41/1989, p. 26; No. 45/1989, p. 28.

註③ 吳東野，「變動中的東德共黨政權」，問題與研究，第廿九卷第三期(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臺北，第一四至二三頁。

註④ Nikolaus Piper, "DDR-Wirtschaft", in *Die Zeit*, No. 51/1989, p. 26.

註⑤ *Ibid.*

註⑥ 高希均，前揭書，第二九八頁。

註⑦ *Der Spiegel*, No. 45/1989, p. 27.

註⑧ *Ibid.*

註⑨ *Ibid.*

註⑩ David H. Bayley, "The Effects of Corruption i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XIX, No. 4/December 1966, pp. 719-723; James C. Scott, "Corruption, Machin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PSR*, Vol. 63/December 1969, pp. 1142-1158;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臺北，桂冠圖書，民國七十二年十月，第二二七至二四五頁。

個體理性行爲 (personal rationality) 並不等於整體的理性行爲 (collective rationality)。東德黨政官僚的貪污腐化風氣，特別凸顯了投資曲解 (invest distortion) 與技術浪費之現象。^②

——東德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的現象，由整個勞動市場人口的分配不均可以看出。農業人口過多 (1987:11%) 與從事交通電訊業的人口比例偏低 (1987:5.3%)，尤其難民逃亡潮爆發的初期，大量的專業技術人員流失，^③使勞動力原本即顯得不充足的現象更加嚴重。去年底，西德的民意測驗機構 (Infratest) 曾對第一批逃往西德的難民作過抽樣調查，^④發現其中的五六%屬十八至卅歲年齡層，專業技術人員更占四四%以上 (二%為醫生、三%為自由業與七%為行政官僚)。這些人中的絕大部份 (六一%) 都是理想主義者，在東德原有不錯的收入，有些 (一五%) 甚至享有渡假別墅，下定舉家遷移的決心，主要是對東德的體制趨於絕望。數月以來類似的人民遷徙，已經使東德的經濟發展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前文所提有關東德社統黨自一九五六年蘇共「廿大」以來，嘗試多面性調整政治與經濟體制架構失敗，除了因為改革受限於指導性的計畫經濟範疇內進行外，社統黨中央不重視改善與民衆、知識界、利益團體及整體社會間的和諧關係，疏於暢通下情上達的管道，形成改革的另一大阻力；同時經濟政策又受到政治教條的支配，所有隱藏在政經體制現代化口號之後的是，社統黨黨政高層不爲人知的腐化生活與頑固的意識形態；^⑤特別是裙帶關係 (nepotism) 成爲東德政治與社會制度下權力來源與拔擢人才的重要基礎。這些經年積累的弊病，才是歷次改革措施半途而廢的主要原因。去年十一月八日社統黨召開十一屆十中全會上，總書記克倫茲 (Egon Krenz) ^⑥亦不得不承認：現階段媒體所公諸的問題實非一夜之間所造成，社統黨制定錯誤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國際經濟情勢疏於瞭解，以及過度美化社會主義一廂情願的心態，尤其是官僚體系的特權壟斷，都形成了助長社會危機的催化劑。^⑦一九七〇年代歐美的政治觀察家，甚少將社統黨政治架構不健全所衍生的諸多社會

註② J.S. Ny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1, No. 2/June 1967, pp. 417-427; 陳鴻瑜，前揭書，第三九頁。

註③ 自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東德的勞動人口平均流失二%，去年迄今逃往西德的東德民衆，其中的勞動人口更高達三分之一。Joachim Nawrocki, "Alles außer Plan," in *Die Zeit*, No. 45/1989, p. 25;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30, 1990, p. 1.

註④ Joachim Nawrocki, "Alles außer Plan," *op. cit.*, p. 25f.

註⑤ Joachim Nawrocki, "Wut und Schmerz nach der Wahrheit," in *Die Zeit*, No. 50/1989, p. 5.

註⑥ 克倫茲的總書記職位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九日社統黨的「特別黨代表大會」中被免除，選出曾任律師的蓋西 (Gregor Gysi) 接替。

註⑦ Egon Krenz, "In der DDR-gesellschaftlicher Aufbruch zu einem erneuerten Sozialismus", in *Neues Deutschland*, November 9, 1989, p. 3.

問題，列為探討東德經濟情勢的重要依據，甚而忽視這一兩年中東德社會流傳漸廣的宿命論調，也難怪當東歐政局演變至去年夏天時，少有人能預見到大批越過匈牙利邊境的東德難民潮，竟會在短短的三個月內促成東德人民空前的覺醒。

肆、後史達林主義下的政治架構重整

東歐共黨在走向西方民主政黨的轉型期中，勢必面臨舊有組織架構之調整，與設法解脫史達林主義對黨政官僚行為模式的束縛。^②從社統黨去年十二月八日「特別黨代表大會」上的爭論看來，領導階層顯然還不明白西方權力分配的意義與政治體系內各項政策範疇的獨立性。社統黨雖處於危機中，却仍然堅稱：在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中，決策過程仍然需要中央集權式的一統原則；換言之，社統黨雖認同行政、立法與司法單位、國家機構、政黨及社會組織之間，需要作明確的權責劃分，^③但是政治體制下所有的次級體系（經濟、社會、宗教或教育等）還是應根據平等的原則，共同為一種目標奮鬥。此一理念所顯示的意義，是要確保社統黨的最高統治權（supremacy），將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視為整個社會的規範原則。這種黨國（party-state）普遍性的專權現象，非但係阻礙制定問題取向與專業性政策之主因，同時亦導致民衆生活的汎政治化（pan-politicization）。

中央集權與威權主義下最常見的貪污和新封建（neofeudal）特權，就道德主義的概念而言，通常係社會發展遲滯的決定性因素。^④當前的社統黨難以同時面對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問題的挑戰，^⑤即在於東德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束縛於一黨集中的架構下，使國家的現代化窒礙難行。其實，莫德洛總理現階段制定的政治革新措施中，鑒於背負過多的傳統包袱，他也不能不願意將政治與經濟的決策過程予以全盤透明化。^⑥十多次的「圓桌會議」談判桌上，各反對團體在這方面施予社統黨的強大壓力，充分顯見社統黨為政者一時之間尚難以適應權力分享的心態。

在體制變革的初期，要社統黨完全公開其過去與現在的所作所為，或有難言之隱。當前，莫德洛雖然對一些已經承諾的

^② Günther Anders, "Braucht eine erneuerte SED ein Politbüro?", in *Neues Deutschland*, December 6, 1989, p. 1.

^③ Gorden Skilling/Franklyn Griffiths (Eds.), *Pressure Groups in der Sowjetunion*, Wien, 1974; *DDR-Gesellschaft, Staat, Bürger*, Berlin (East), 1978, p. 26.

^④ 陳鴻瑜，前揭書，第二二七頁。

^⑤ Werner Weidenfeld/Hartmut Zimmermann (eds.), *Deutschland-Handbuch. Eine doppelte Bilanz 1949-1989*, Baden/München, 1989.

^⑥ Joachim Nawrocki, "Regieren auf Treibsand", in *Die Zeit*, No. 5/1990, p. 4.

法案規畫預作局部修正，但是朝野達成未來提昇人民議院的問政功能，以走向議會政治的共識，則非任何團體所能輕易推翻。社會主義社會的變革與現代化，所亟需的已不止於對特定政策範疇與政治團體的局部放鬆，而是要朝向一個「開放社會」的最終目標邁進；其中基本人權的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和言論自由、建立社會利益代表之管道、以及確保個人生活不受國家與政黨干預等等，對一個處於後史達林主義的社會而言，尤其具有深遠之意義。^④

西方國家的政治革新措施，大都是從人事的更換著手。部份東歐國家在人事更迭之同時，還要受到民意的壓力，必須對教條派的共黨元老，特別是獨裁時代竄升的當權派，施予司法審判與展開黨內的清算鬭爭。社統黨去年底十中全會決定更換黨的名稱之前，其所進行的組織革新措施，就形式上而言，雖然參考了西方政黨的組織架構型態，^⑤而實質上仍不出規劃成一個現代化社會主義政黨的理念。^⑥在新選出的一百名「理事會」成員中，雖僅有三名是何內克時代的中央委員；同時處於過渡階段的「工作委員會」內，亦不乏改革派人士，^⑦但就改革派所提出的「行動計畫」(Aktionsprogramm)綱領與社統黨新領導層多次言論看來，東德的改革仍有其局限性。一些重要的革新措施：如草擬旅遊法及傳播媒體法、廢除刑法中的逃亡叛國罪(第二二三條)、公佈環境污染評估報告、成立憲法法院、引進西方的民事役制度、授予國務院大赦權、強化地方自治、以及改善意識形態的教育方式等等，在相當程度上已接近西方國家的標準。然而，基於東德社會各階層的民主素養與歷練尚不夠成熟，使部份革新措施還處於口惠實不至的階段，特別是朝野在制定完善的經濟政策方面還很茫然。於今雖少有人會再堅持過去的經濟策略，但是却又不想完全告別社會主義，因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socialist market economy)或「市場導向的計畫經濟」(planned economy of market orientation)等構思應運而生，^⑧希望找出一條能自圓其

註① 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On the Predicaments of European Socialism,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l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London/New York, 1988.

註② 社統黨的組織結構重整中，廢除原有的政治局、中委會、總書記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等名稱，並以主席、副主席、全代會、理事會和裁決委員會由下而上的組織型態取代之。"Parteiorganisatorischer Gysi: Hart arbeiten für die Rettung des Landes und unsere Partei," in *Neues Deutschland*, December 11, 1989, p. 1; *Die Welt*, December 9-11, 1989, p. 1f.

註③ Für einen alternativen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Diskussionsstandpunkt des Arbeitsausschusses zu der von der Basis ausgehenden Neuformierung der SED als moderne sozialistische Partei", in *Neues Deutschland*, Dezember 8, 1989, p. 3.

註④ 黨理事會中的三名原社統黨中央委員是：Hans Modrow (民間總理) / Gerd König (東德駐蘇聯大使) / Herbert Richter (企業負責人)；改革派著名人士包括：Gregor Gysi (新任黨主席) / Dieter Klein：Markus Wälf / Klaus Köpcke / Roland Wotzel / Wolfgang Berghofer (今年元月已率同卅九名黨員加入東德社民黨) / Lothar Bisky.

註⑤ Klaus-Peter Schmid, "Wirtschaftsreform in der DDR-Suche nach dem dritten Weg", in *Die Zeit*, No. 51/1989, p. 26.

說的改革道路。

伍、走出第三條發展模式道路的可行性

屬於社統黨革新派重要人物之一的東柏林宏保 (Humboldt) 大學教授克萊恩 (Dieter Klein)，曾針對東德的體制危機撰「社會主義正處於契機 (chance) 與沒落 (decline) 間作抉擇」乙文，^④呼籲東德人民掌握革新社會主義的契機。克萊恩的觀點代表了數千名社統黨員與部份知識界的意見，^⑤其與莫德洛任命的經濟部長渥爾夫女士 (Christa Wolf) 等內閣成員提議建設東德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構思，透露出東德知識份子放棄革新社會主義機會的共同心聲。最近，享有盛名的經濟學家庫辛斯基 (Jürgen Kuczynski) 所提「回歸列寧」(Back to Lenin) 的涵意，^⑥為的是要在重建社統黨為新型態政黨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列寧理論中的「先鋒」(Avantgarde) 角色，堅持政黨中央集權的組織原則。^⑦庫辛斯基的這種訴求事實上並未獲得社統黨基層的共鳴，絕大多數黨員傾向認同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戰爭與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中權力分配與保障民權的主張。^⑧如果政治學中將「革命」的定義詮釋為「政治與社會關係結構作徹底之變革」，^⑨那麼東德這次「柔性革命」(soft revolution) 就實質上而言，已經促成了領導階層菁英結構的改變、修憲與國會權力平衡關係的轉變，與庫辛斯基所謂「保守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⑩的意義並不全然相同。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勢力通常在面對舊有體制產生危機現象時，會與民意相結合。現實社會主義的幽靈在殞落與轉換的過程中，基本上符合杜意契 (Karl W. Deutsch) 與艾森史德 (Shmuel Eisenstadt) 所提出的「國家建構」(nation-

註④ *Neues Deutschland*, November 11/12, 1989, p. 3.

註⑤ 主張東德再進行一次「保守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以徹底改革社會主義的學者為數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經濟學家庫辛斯基 (Jürgen Kuczynski)。

註⑥ Jürgen Kuczynski,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Neues Deutschland*, November 8, 1989, p. 4.

註⑦ Detlev Ahlers, "Im Gespräch Gregor Gysi-Stalin nein, Lenin ja," in *Die Welt*, December 14, 1989, p. 2.

註⑧ Gert-Joachim Glaesner, "Vom 'realen Sozialismus' zur Selbstbestimmung,"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No. 1-2/1990, pp. 3-20, here p. 18.

註⑨ Iring Fetscher, "Revolution," in *Pipers Wörterbuch der Politik, Politikwissenschaft Bd. 1*, München, 1985, p. 870.

註⑩ Jürgen Kuczynski, *op. cit.*, p. 4.

building) 概念，^⑤史達林主義的遺毒被清除後，民族認同感的重振與進行國家的再造 (nation re-building) 工作，理應循序漸進。在這一方面，身為德意志民族一部份的東德，長期以來內部受到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挑戰，對外獨立自主的活動空間亦受到客觀因素的限制，^⑥先天上不易建立符合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國家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現代化發展理念。東德非但無法像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單獨決定德意志民族的未來走向，同時幾十年來在印證社會主義優於（西德）資本主義的歷程中，還要面對生存的問題；於今，除非社統黨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幻想能夠實現，否則東德將難以擺脫內外交迫的困境。

如果依據東柏林的國家計畫委員會所提出的警告：東德經濟發展中真正令人憂心的是，產品價格未能隨市場機能調整、產品沒有競爭力、勞工未按工作績效計酬與缺乏西方國家的援助。^⑦那麼，前三項問題的主動權應操之於東德當權者的手中；換言之，民主社會主義黨（社統黨）想作根本的解決，必須率先修改憲法第九條至第十二條中有關生產工具國有化、中央集權計畫經濟體制與企業國營化等規定，將實施了四十年之久的計畫經濟導向市場經濟。在轉型期間，東德並不一定完全翻版西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驗，祇要能找到出路，東德可以排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不必要的抉擇。渥爾夫女士針對此一爭論所提出市場傾向的計畫經濟構思，追根究柢祇是持續其指導性經濟政策的另一個代名詞。布拉格之春時期著名的捷克經濟學家席克（Ota Sik），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初即會不斷倡議以非教條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經濟改革，^⑧他不反對選擇第三條發展模式之路，並建議經由學術的研究使政策透明化，同時在相當程度上亦能直接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嘗試中的理論依據；但是加速引進西方市場機能主導的企業競爭體系之同時，却不能忽視整體經濟的架構（如失業率、物價變動、國民生產毛額或政府收支平衡等問題），必須強調經濟政策中的目標、發展重點與優先順序。現階段東德內部有關這一方面的問題儘管時有爭議，然而基本的一些原則尚能建立共識：例如 1. 生產、消費與投資的規模是否應奠基於競爭的基礎；2. 企業資

註⑤ Shmuel Eisenstadt/Stein Rokkan (Eds), *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 Beverly Hills/London, 1973; Karl W. Deutsch,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Boston/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0, Chapter IV.; Karl W. Deutsch, *Staat, Regierung, Politik*, Freiburg im Breisgau, 1976, pp. 102-134.

註⑥ Michael Reiman, "Nationale Elemente in den Reformbewegungen Osteuropas," in Hannelore Horn/Wladimir Knobelsdorf/Michael Reiman (Eds), *Der unvollkommene Block-Die Sowjetunion und Ost-Mitteleuropa zwischen Loyalität und Widerspruch*, Frankfurt/M., 1988, p. 231.

註⑦ Klaus-Peter Schmidt, op. cit., p. 26.
註⑧ *Ibid.*

金應否由勞資雙方共同享有，並擴大勞工參與決策之層面；3. 建立生產工具私有制；4. 採行外資合營與公民營企業並存的混合制。東德國家計畫委員會經濟改革小組曾建議採行部份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並交予各政黨、大學與企業界充分討論，其中考慮研習的模式主要有三項：^⑤

1. 戰後初期法國制定經濟復甦政策中，所採行的發展基本工業、經濟結構現代化與促進進出口的措施；
2. 瑞典社會黨基於福利國家的理念，將民生之富裕建立於經濟繁榮的基礎上；
3. 日本通產省（工業外貿部）為結合政府與企業界利益的居中協調模式，可以促進經濟目標的實現。

東德想成功地走向改良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事實上有其困難存在，其中以朝野一時尚無法徹底揚棄計畫經濟政策的舊有觀念，^⑥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陌生，阻礙到經濟改革政策細節的制定，導致迄今難以全面法制化。如今東歐國家正處於喜新「Market」厭舊「Marx」的階段，需要的是時間與耐性。

東歐國家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除了與西方合作外，似無其他更好的選擇。東德發展中最得利的因素，是有西德這一位經濟實力強大的長兄，其資金缺乏的問題不僅可以借助西德的經援，先謀求改善勞動力短缺現象。^⑦同時亦可經由雙方各層面的合作關係，解決環保、醫療保健或科技發展等其他方面之問題。如前文所作的分析，東德共黨當權派在改革的歷程中，心態上之所以難作調適，正因為懼怕變革後的東德會產生新的主權危機，若非步上德國再統一的路程，即可能遭到西德經濟的併吞（*verschlingen*）。^⑧

東德共黨在民意的壓力下，政治革新措施與經濟改革脚步無法調和與搭配，使人民感覺不出具體的改革步驟與成效。西德朝野多年來為完成國家統一任務所下的功夫，早已具備應變之能力，能充分掌握時機進行對東德的救援工作，各級政府或企業界也多能配合柯爾（Helmut Kohl）的「十點統一計畫」（*Ten-Point-Program*），並針對東德即將制定的「合資企業法」（*Law of Joint-Venture*）展開多項合作關係，^⑨特別是西德部份邦已開始依據人口、區域面積、或工業發展性質，聯合東德與其他西（東）歐國家條件適當的省份，進行「歐洲小區域統合模式」之實驗。^⑩

註⑤ *Ibid.*

註⑥ 吳東野，東歐邁向自由經濟體制的心結，自由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元月十八日，第十一版。

註⑦ Theo Sommer, "Teilen, wenn die Teilung endlich enden soll," in *Die Zeit*, No. 7/1990, p. 1.

註⑧ "Putzen im Westen," in *Die Zeit*, No. 49/1989, p. 16; "Ein Staatenbund? ein Bundesstaat?," in *Der Spiegel*, No. 49/1989, pp. 24-29; "In Angst vor der Einheit," in *Der Spiegel*, No. 51/1989, pp. 16-25.

註⑨ Nikolaus Piper, *op cit.*, p. 26; "Ost-West-Partner: Falsche Kostüme," in *Der Spiegel*, No. 3/1990, p. 41f.

註⑩ "Europas Vier Tiger," in *Der Spiegel*, No. 1/1990, p. 47f.

陸、結論——德國統一為最終解決之道？

未來東德挽救體制危機的成敗在於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的成效又須視政治架構重整是否順利而定。當前，若論及改善東德經濟困境的方式，勢必要與德國統一問題相結合考量。去年十一月底，位於來比錫的「中央青年研究所」(Zentralinstitut für Jugendforschung)首次對德國統一問題所作的調查結果，還顯示超過半數(五二%)的東德人民對統一抱持懷疑的態度或根本拒絕，^⑤甚至在一週之後，兩德研究機構合作舉行的問卷調查中，依然印證東德人民排斥國家統一的構想；^⑥然而從今年初開始，東德的經濟竟如水銀瀉地般地持續惡化，非但投資意願趨近於零，外債總額也從一九八七年的一〇四億美元，迅速增加至現在的二〇六億美元。工商業界蕭條的景象，幾乎已使東德經濟瀕臨於破產與崩潰的邊緣，一些國家甚而暫停對東德的原料輸出，使東德許多企業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作業。^⑦儘管莫德洛總理元月底打出最後一張王牌，將自由選舉提前至三月十八日舉行，並懇求民衆對共黨政權多忍耐些時日，却依然擋不住潮水般的人口外流現象。東德各地不斷爆發的罷工與示威活動中，要求兩德立刻統一的呼聲愈來愈高。民心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徹底絕望，以及在追求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富裕生活的心態下，社統黨再提出任何誘人的改革措施，也難挽回人心。未來東德社會主義體制的存廢，將取決於兩德統一的進度。

戰後德國問題的發展，從未像近幾個月以來能掌握如此有利之條件，然而基於此一問題的複雜性，即使統一的主動權完全操於兩德人民手中，欲穩定東德當前的情勢，恐仍需透過雙方領導人一連串的協商，其中建立經濟合作共同體與組成貨幣聯盟，勢將為統一前的必經過程。今年三月東德即將面臨歷史上空前的自由選舉，而西德亦將於十二月初舉行國會改選，兩德統一問題不僅會成爲選戰的主要議題，同時也會影響到選舉的結果。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兩德統一的態勢，亦極可能會對其他東歐國家進行的體制改革，產生深遠之影響。在內外多重因素交錯運作下，東歐未來在「非共化」的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再增添近代國際政治史上重要的一頁。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廿日完稿

註⑤ "Demokratie braucht Demoskopie. Interview mit Pro. Dr. Walter Friedrich, Direktor des Zentralinstituts für Jugendforschung," in *Neues Deutschland*, December 7, 1989, p. 6.

註⑥ 參與合作的研究機構爲位於西德曼勒菲(Bielefeld)城的艾姆尼研究所(Ernid-Institut)與曼海姆(Mannheim)的選舉研究組(Forschungsgruppe Wahlen)，以及東德的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Soziologie-Institut der DDR-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結果顯示反對德國統一的比率增高至七十一%。見*Der Spiegel*, No. 51/1989, pp. 86-89, at p. 89.

註⑦ "Es kracht schon im Februar," in *Der Spiegel*, No. 6/1990, pp. 14-25, 110-112.